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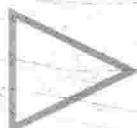
经济发展中的 制度与政府作用

JingjiFazhanZhongDeZhiduYuZhengfuZuoyong

习明明 | 著



经济发展中的 制度与政府作用



JingjiFazhanZhongDeZhiduYuZhengfuZuoyong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习明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政府作用 / 习明明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 - 7 - 210 - 09926 - 0

I. ①经… II. ①习… III. ①经济制度 - 研究②行政
干预 - 市场经济 - 研究 IV. ①F014. 1②F014.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8973 号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政府作用

习明明 著

责任编辑:万莲花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650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1

字数:162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9926 - 0

赣版权登字—01—2017—91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定价:36.00 元

承印厂: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背景	1
第一节 政治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1
第二节 民主多元化与民主内涵的争议	5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6
第二章 政治制度、投资与经济增长	9
第一节 引言	9
第二节 数据与模型	15
第三节 回归估计与稳健性检验	21
第四节 民主作用再检验	3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39
附录:166个国家或地区名称和代码	41
参考文献	43
第三章 政治制度、收入与腐败	48
第一节 引言	48
第二节 数据描述与模型设定	52
第三节 民主对腐败作用的实证分析	58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65
第五节 本章小结	73
附录:163个国家或地区名称与样本频率	74
参考文献	77

第四章 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分配	80
第一节 引言	80
第二节 数据描述与模型设定	86
第三节 政府政策对城乡收入影响的实证检验	93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97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00
附录:样本中 81 个县(市)名称及分布情况一览	102
参考文献	104
第五章 发展战略、城乡收入与空间溢出效应	108
第一节 引言	108
第二节 理论假说	112
第三节 数据描述与基准模型	113
第四节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116
第五节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的实证检验	120
第六节 本章小结	123
参考文献	125
第六章 发展战略、大推进与经济增长	127
第一节 引言	127
第二节 基准模型	131
第三节 模型的扩展:考虑生产率差异与互补性	136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41
附录 A:公式(12)证明	142
附录 B:Cobb – Douglas 生产函数证明	144
参考文献	144
第七章 发展战略、信息化与经济增长	149
第一节 引言	149
第二节 数据描述与相关性分析	152

第三节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56
第三节 江西的案例	159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67
参考文献	170

第一章 研究背景

第一节 政治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根据日本学者福山的研究,政治制度起源于中国秦始皇时期。但是,民主制度的确起源于西方。民主一词“demo + cracy”,含义为“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该词源于希腊文。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也发源于古希腊。^①但自诞生之初至十八世纪末的 2000 多年历史中,民主都一直饱受争议(王绍光,2008;Dahl,2000)。^②在希腊语中,“‘民主’即意味着乡巴佬的统治,是一个非常‘肮脏’的词汇”。^③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认为国家和城邦应该由有知识和有才干的精英来管理,而不是抽签选举实行的民主制,这种极端化的自由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最终将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分别对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四种体制提出了批评。他在《法律篇》中提出,所有的政体形式都是由君主制和民主制演化而来。如果要选择自由与法律的密切结合,一个国家的政体就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因素,因此,他设计并提出了一种混合体制。

直到最近的 100 多年中,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才被认为是好制度。为什么

^① “就像蒸汽机的发明一样,把民主看成是一次性发明的想法也可能是错误的”(Dahl,2000)。

^② 王绍光,《民主四讲》,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 2—3 页。王绍光认为第一个采取民主政体的是古希腊的希俄斯岛(Chios),约出现在公元前 575—前 550 年。比希腊雅典民主(约公元前 508—前 323 年)要早半个世纪。

^③ 王绍光,《民主四讲》,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 13 页。

呢？这是因为从现有的全球区域发展格局来看，绝大多数 OECD 成员都是高民主、高收入、高福利和社会高度稳定的国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贫困和两极分化，例如布隆迪、刚果、卢旺达、苏丹、越南、老挝、不丹等，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不高且较为贫穷。两相比较，很自然地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观点：民主在减少贫困、不平等、腐败和犯罪，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功效，从而民主是一个好制度。这种观点是否成立，还有待理论与实证的进一步分析和检验。

王绍光（2008）认为，宪政民主名义上是通过宪法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民主的体现。实际上则是保护了某些个人权利不受多数人意志控制，限制了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从本质上来看，它就是反民主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实际上是把“民主”关进了“鸟笼”，给“民主”划了个圈，从而使民主在除政治领域以外的绝大多数领域里都不能适用。^① 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其关于民主功效的质疑，却是值得深思。

从全球区域发展的当前格局来看，在收入方面，民主国家中固然有富裕的如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也有贫困的如印度、尼泊尔、马拉维、马里、贝宁等。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以现值美元计算（current US \$），2011 年印度、尼泊尔、马拉维、马里、贝宁等民主程度相对较高国家的人均收入仅分别为 1489 美元、619 美元、371 美元、669 美元、802 美元。在腐败方面，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 年发布的《全球腐败监测报告》（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Report），同样是来自欧洲的民主国家，丹麦和芬兰的清廉程度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而希腊和意大利的清廉程度还不如古巴、约旦、阿曼、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威权国家。中低收入的民主国家如蒙古、巴拉圭、尼加拉瓜、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里等，其腐败程度则更加糟糕。此外，在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民主国家之间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过去二十年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而与威权相比，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更能减少贫困、不平等和

^① 王绍光，《民主四讲》，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 35—38 页。

腐败,促进投资和国民经济增长,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和幸福指数?

无论是所谓的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政治最终都是由极少数精英分子控制,这就是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s of Oligarchy)。^① 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也提出:“不管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数人的游戏。”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去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②因此,就政治而言,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本质而言都只是少数人的“游戏”。既然如此,现代所谓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减少贫困、不平等、腐败、犯罪,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社会信任和幸福指数呢?现代民主到底是更有利高收入阶层还是低收入阶层?

巴林顿·摩尔(1966)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依靠等价交换和市场竞争来获取利润,他们不会抵制民主,因而资产阶级的诞生是有利于民主制度的产生的,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③统治阶级是天生不喜欢民主的,对民主的要求来源于非统治阶级的政治诉求。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于普通劳苦大众而言,更直接的需求是衣食住行,政治上的民主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得到的实际利益并不多。只有大地主、商人和资产阶级,他们从市场交换中获得的利润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而依靠政治上的庇护,总是没有自己直接参政来得稳靠,因而他们对民主的诉求最为强烈,得到的利益也会更多。他认为,从这个方面讲,“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述一点也不为过。

按照法国学者卢梭的观点,政府就是人民与主权者之间的一个中间体,立法权属于并且只能属于人民,政府与主权者之间只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各项权力,政府的统治意志就只能是公意或法律,主权

^① [德]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 1876—1936),《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何兆武译,2003年第三版,第84页。

^③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苗、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者随时都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①

“democracy becomes truly stable only when people come to value it widely not solely for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but intrinsically for its political attributes.”^②民主只有在其价值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之后才能真正长久，仅仅为了经济与社会利益而建立的民主是不稳固的。

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区别：第一，雅典民主没有选举产生的政府。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和议员是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产生的，没有报酬，是一种责任与义务；第二，雅典民主没有代议制机构，实行的是公民直接参与；第三，雅典民主没有政党，所谓的多党制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那是在20世纪之后的事情。^③

“不少人以为，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这种设计本意正是为了限制民主。立法权一分为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这样的制度设计彻底颠覆了议会主权、立法权至上的原则。”^④

法布尔(Jean - 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的“松毛虫民主”：有一种动物叫松毛虫，以食松叶为生，全身长满刚毛，因而得名。但与蜜蜂等其他昆虫不同，松毛虫并没有“老马识途”的本领。它们出行必须边走边吐丝，以便于返巢时可以顺着自己吐的丝回来，不致于迷路。与人类一样，松毛虫也是群居动物，由于不同的松毛虫出行时吐的丝路经常交错在一起，因而松毛虫“回错家”也是经常的事。但与人类不一样，松毛虫进入到陌生人家并不会被驱赶，而是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起居，并帮助“主人”修建“房子”。它们完全没有私有产权的观念，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更为有趣的是，和羊群一样，松毛虫每次出行也都必须有一只“领头虫”，然后呈“一”字展开，后一只的须触到前一只的尾。但与羊群和人类不一样，松毛虫的“领袖”既不是选举推出来的，也不是由能力高的“精英”来担任的，而是随机产生的！这与古希腊雅典民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雅典民主已经消退两千多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何兆武译，2003年第三版，第71—78页。

^② Diamond, Larry J. (1992)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5, 450—99.

^③ 王绍光，《民主四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页。

^④ 王绍光，《民主四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0页。

年,一去不复返了。而松毛虫的“民主”制度,却使得它们的种群能够一直繁衍,生生不息,是真正的民主。^①

第二节 民主多元化与民主内涵的争议

仅仅用“是否多党执政”来衡量是否民主可能是片面和狭隘的。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个能否”概括得更为具体和实事求是:“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关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争论的焦点,大体都是关于“西方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观点,民主体制的种类有很多,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对于民主的内涵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存在诸多的争议。例如,常见的民主类型有:^②

(1)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这种民主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由一个代表性的组织和政府来有效保障公民的自治权利。

(2)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民主)(Socialist/Marxist delegative democracy)。这种体制强调国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公平和公正。

(3)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这种民主存在一些自由的民主机构,但强调社会团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制度结构发展。

(4)参与制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这是一种精英代理的自由民主,在民权社会中强调公民授权与公民的政治参与。

(5)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强调不分等级、不分地方的民主政

^① [法]法布尔(Jean - 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昆虫记》,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版,第28—42页。

^② Kurki Milja, “Democracy and Conceptual Contestability: Reconsidering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in Democracy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0, 12 : 362 – 386.

治,关注社会运动的相互影响。

(6)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强调了政治协商机制,从而产生一个更有效、反应更快的民主政府。

(7) 国际主义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通过一些创新的方式或组织来促进民主,例如全球性政党、全球性税收政策等。

此外,还有女权主义民主、环境保护主义民主、伊斯兰民主和儒家民主等,其中,儒家民主观念强调集体和民族的利益,提倡舍小家保大家的精神。当然,这些民主类型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根据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来定义。意在说明,通往民主并不是只有一条道可以走。世上没有哪个民族是不向往民主的。只是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民主观念,而每一种民主又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特点,没有哪个民主制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国家所谓的“非自由民主即不是民主”的思想,实际上只是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完全照搬照抄,就容易引发各种民粹主义(populist)轮番上阵的政治动荡,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曾经遭受过许多质疑,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同样地,我们应该继续发扬探索精神,从发展的角度看待民主,推进民主多元化,兼容并蓄,充分吸收各种民主体制的优点,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路。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尝试去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以食为天,在老百姓收入和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什么都是空谈。第二,民主体制的功效是有限的。民主体制不一定就比威权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收入公平、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第三,政治学家都心照不宣,无论是所谓的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政治归根到底都只是少数人的游戏,这就是政治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s of Oligarchy)。^①第四,探讨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和收

^① [德]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 1876—1936),《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入分配改善的促进作用。第五,研究政府发展战略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二章使用166个国家和地区1972—201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民主对投资—消费比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人均GDP超过456美元之后,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投资倾向相对越低,消费占比相对越高,从而民主在增加居民消费占比的同时可能会减少资本积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威权在促进投资的情况下更有利经济的增长。但如果人均GDP低于456美元,由于人们的收入仅能维持生存,投资—消费比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威权和民主体制对投资—消费比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如果没有外生的冲击,这些国家将陷入持久的贫困。因此,我们认为在增长的初期,威权体制只有满足两个条件之后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当地的人均收入超过456美元;二是投资必须超过一定的门槛。

第三章使用163个国家和地区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民主与收入的交互作用对腐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民主对腐败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当人均收入到达一定水平之后,民主水平提高才能减少腐败,并且民主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加强。第二,民主并不是减少腐败的决定因素。在本章做的48次回归分析中,民主变量在5%水平下显著性比例只有54.2%,而人均收入与政府消费的显著性比例相对更高。对于减少腐败而言,提高国民收入和增加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支出比例都比民主化更为重要。此外,腐败还受人口数量、通货膨胀、外贸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

第四章使用1989—2011年江西省81个县(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发展战略或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章研究发现:(1)教育扩展、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经济地理因素,如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3)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有效灌溉面积和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提高,可以显著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4)农民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由于农用机械总动力反映的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并不一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我们

还发现区域金融发展并没有像理论预期那样能够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第五章基于1978—2014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角度,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之间存在很强的空间关联,且溢出效应为正。城市偏向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而工业部门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并不会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此外,研究还进一步验证了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长期趋势,并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第六章基于大推进理论,研究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一个落后国家或地区,应该对所有部门进行投资,这就是说,大推进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所有部门都要按照同一比例进行投资,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应该优先发展那些生产率高的部门,但同时也要对生产率最低的部门进行投资。优先发展生产率高的部门就是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与Rostow的主导部门优先发展和Hirschman提出的联系效应理论是一致的。但对那些生产率最低的部门也不能忽视,也要进行适度投资,这与平衡增长理论是一致的。因此,本章把平衡增长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统一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

第七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构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以建设信息社会为目的,借鉴国内外两化融合的推进经验,在对重点支撑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研究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发展。

第二章 政治制度、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章使用 166 个国家和地区 1972—2010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民主对投资—消费比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人均 GDP 超过 456 美元之后,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投资倾向相对越低,消费占比相对越高,从而民主在增加居民消费占比的同时可能会减少资本积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威权在促进投资的情况下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如果人均 GDP 低于 456 美元,由于人们的收入仅能维持生存,投资—消费比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威权和民主体制对投资—消费比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如果没有外生的冲击,这些国家将陷入持久的贫困。因此,我们认为在增长的初期,威权体制只有满足两个条件之后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当地的人均收入超过 456 美元;二是投资必须超过一定的门槛。

第一节 引言

从现有的跨国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收入都非常高,例如,OECD 的所有成员国既民主又富裕。^① 与此相对应,大多数的非民主国家都很贫穷,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地区。^② 这种既定的跨国收入格局往往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民主和收入之间存在着

^① 截至 2012 年,OECD 共 34 个成员国,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斯洛文尼亚。其中,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斯洛文尼亞为 2010 年新加入成员国。

^② 例如布隆迪(Burundi)、刚果(Congo)、卢旺达(Rwanda)、苏丹(Sudan)、越南(Vietnam)、老挝(Lao)、不丹(Bhutan)等,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不高且国家贫穷。

潜在的因果关系,民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最终予以否认。众多研究表明,民主不一定能够带来收入增长,但收入的提高会促进民主。例如,Lipset(1959)研究发现收入的提高可以改进民主。Huntington(1991)认为经济发展增加了人们对民主的欲望。他使用希腊、西班牙、巴西、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说明收入对民主具有推动作用。Helliwell(1994)研究发现收入提高有利于促进民主进步,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Barro(1997,1999)研究发现民主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生活标准的提高有助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①此外,Londregan & Poole(1996),Papaioannou & Siourounis(2006)等研究也都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曾几何时,这一充满智慧的传统观点几乎令所有人信服,因为它能解释绝大多数国家民主与收入的现状。例如印度(India)、尼泊尔(Nepal)、马拉维(Malawi)、马里(Mali)、贝宁(Benin)等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并不高,可见民主不一定能够带来收入增长。^②而大多数的高收入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可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主。

但是,也有学者持否定意见。例如,Przeworski et al.(2000)详细分析了135个国家1950—1990年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使政治制度民主化水平提高,并且政权类型也不会对一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威权体制下国家的人口增长比民主体制下更快,所以民主体制下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更快。Acemoglu et al.(2008)使用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方法,对136个国家过去500年的收入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做了稳健的估计和严密的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收入提高不

^① Barro(1997, 1999)提出的生活标准包括人均GDP、基础教育成就和基础教育性别差异三个主要变量,但基础教育性别差异是与民主程度负相关的。有趣的是,除了生活标准之外,他还发现城市化水平与民主程度负相关,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与民主程度正相关。

^②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以现值美元计算(current US \$),2011年印度、尼泊尔、马拉维、马里、贝宁等民主程度相对较高国家的人均收入分别为:1489美元、619美元、371美元、669美元、802美元。

一定会促进民主,民主并不是收入的必要条件。^① 例如,科威特(Kuwait)、阿曼(Oman)、卡塔尔(Qatar)、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巴林(Bahrain)等君主制国家的人均收入很高,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不断提高。^② 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众多国家纷纷从民主转向威权,则更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例如,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古拉特的文人政府被推翻;1966年,阿根廷建立了自己的威权政府;1968年,秘鲁的军人发动政变建立了威权政府;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威权政府。10年间,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较高水平上促使民主政体崩溃,使得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呈正相关的传统观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Donnell, 1973)。

同样,大量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民主比威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③ 例如,Doucouliagos & Ulubasoglu(2008)使用元分析(Meta - Analysis)的方法对84篇关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做了详细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民主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通货膨胀、政治动荡、经济自由等因素间接影响经济增长。Kisangani(2006)使用非洲国家的民主与发展数据发现,民主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许多政权发生更替的国家,民主程度提高之后经济增长反而下降。事实上,很多国家或地区在早期的增长过程中民主

^① 尽管Acemoglu et al. (2008)的实证结果表明至少在过去10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说收入不是民主的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现在富裕的国家多数都是民主国家呢?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民主和收入虽然不是因果关系,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被多种不同的因素同时影响,从而使得不同的国家走向不同的发展路径。恰好,有些国家既民主又富裕,有些国家既贫穷又专制。他们的假定前提是,过去500年至最近100年里的某个关键时刻,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不同的国家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牵强,民主的形成应该不仅仅是在某个关键时刻由历史偶然的因素造成,我们对此持保留意见。

^②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以现值美元计算(current US \$),2011年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巴林等君主制国家的人均收入分别为:62664美元、25221美元、92501美元、20540美元、18184美元,其中巴林人均收入为2010年数据。

^③ 政治学通常将体制划分为三类:民主、威权和极权。但是,除了不以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目标之外,极权与威权之间存在众多的相似点(至少它们都代表民主程度不高的政体)。因此,本书不打算就威权和极权的区别做过多的阐述,在不影响到本书分析框架和结论的情况下,我们仅仅是将极权看成是威权的极端。